



葫芦岛党史人物传

第一卷

中共葫芦岛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谨以此书向中国共
产党成立 80 周年献礼！

编 审 许凤琴

主 编 池凤臣

副主编 王凤山

编 辑 梅兰亭 张雪莉 石国民

王天月 吴忠博 黎菲菲

校 对 王凤山 李凌宝

序 言

中共葫芦岛市委常委
市委秘书长 郑宏伟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前夕，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的《葫芦岛党史人物传》（第一卷）出版了，这是全市党史工作者献给建党 80 周年的一份厚礼。

《葫芦岛党史人物传》（第一卷）收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主要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人物传记 50 篇。该书资料翔实，内容生动，文字隽永。有的短小精悍；有的酣畅淋漓。是一部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全书以党史人物个人实践活动为中心，记述了他们的家世、童年、青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以及走上革命道路的成长过程；总结了他们的追求与探索、成功与挫折的经验教训；颂扬了他们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和丰功伟绩；记录了他们真实、光辉的人生道路。通过大量真实生动的描述，一个个鲜明富有个性的党史人物跃然纸上：像领导轰轰烈烈民众抗捐运动的张明久；出身绿林，后来奋起抗日，击溃日军古贺联队的亮山；不愿做亡国奴，与日寇势不两立的“天狗”司令郑桂林；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的党的好干部钟卿；运筹帷幄，屡立战功的李运昌、王国权……他们的业绩与日月同辉、共山岳永存。他们的英名将载入史册，永垂不朽！

市委党史研究室在组建晚、人员少、任务重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以锲而不舍的顽强毅力，仅用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 32 万字人物传记的编写工作，填补了我市没有地方党史人物传的空

白。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首先，为党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编写党史人物传是党史研究的基础工作。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活动，是通过党史人物活动来体现的。党史人物活动的舞台就是党史研究的背景。通过对党史人物有血有肉的真实记述，尘封的历史事件变得鲜活生动，枯燥的研究工作变得丰富多彩，党史研究的资料也更加完备。其次，为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少年的教育工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无数革命先烈和前辈们坚贞不屈，流血牺牲，英勇奋斗，无私奉献，历数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为葫芦岛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许多年轻人包括一些党员干部对这段历史还不熟悉或知之不多，不能深刻领会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因此，利用党史题材对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使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青少年更加珍惜今天，不忘过去，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抚今追昔，饮水思源。回顾历史，立足现实，着眼未来。我们要进一步弘扬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坚定理想信念，为把葫芦岛建设成为繁荣富庶、文明美丽的现代化沿海开放城市而努力奋斗。

付梓之际，书此为序。

2000年 10月 8日

目 录

序 言	(1)
李运昌	(1)
邓文山	(27)
刘克欧	(41)
仇友文	(47)
邓文风	(55)
郑桂林	(63)
亮 山	(77)
陈 英	(81)
马 骥	(91)
李昆山	(95)
贾俊儒	(101)
王国权	(105)
刘镇华	(121)
张明久	(129)
屈亦经	(137)
李 勃	(139)
周治国	(149)
郭文联	(159)
罗 文	(165)
甘重斗	(171)
佟励生	(179)
李华春	(185)
程式兰	(191)

宋国祥	(195)
师小帆	(205)
李贺年	(209)
吴力全	(215)
钟 卿	(221)
周 敏	(227)
杨清起	(233)
项国臣	(249)
魏 轩	(255)
王 溥	(259)
齐 英	(267)
张德泽	(277)
狄喜彬	(287)
郭力夫	(291)
赵天龙	(299)
于海生	(303)
李 晓	(309)
朱 英	(315)
潘 凯	(321)
汪余山	(329)
许 忠	(335)
董万功	(339)
杨占清	(349)
刘福余	(355)
莫 德	(363)
徐振峰	(371)
马 银	(389)
后 记	(395)

李 运 昌

(1908—)

一

李运昌，原名李方歧，曾用笔名鹿鸣，1908年9月21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木瓜口村。木瓜口村位于乐亭县城东，距县城7公里，滦河、二滦河从村北流过，是一块土肥水美的平原绿洲。木瓜口村的东南便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故乡——大黑坨村。

李运昌父亲李信是村里的泥瓦匠，喜欢读书，家中有几箱子书，常给儿女们讲历史故事。李运昌共有姐妹兄弟5人，兄弟二人少亡，只存一胞姐及一胞妹。母亲孙氏，勤俭贤慧，治家有方。家中开过面铺，为人加工白面，每年积蓄下来的钱便置买零星土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李运昌父母终生的夙愿就是为儿女留下一份地产，让子女吃穿不愁。

1922年，李运昌14岁时在本村念完高等小学。1923年乐亭县城成立了4年制的中学，也是全县第一所中学，李运昌经过考试，成为乐亭县第一所中学的第一代学生。

乐亭中学是一所新型的学校，校长王岑伯，乐亭县王滩人，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跟李大钊很熟，1923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乐亭中学不安排旧课程，向学生们讲授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苏联十月革命，这些新思想、新观念开始在李运昌幼小的心灵中扎根。

乐亭县的旧势力一看乐亭中学变了样大为震惊，到处宣传乐亭中学赤化了。县劝学所（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从经费上给学校制造困难，妄图卡住中学，把新文化运动压下去。已经接受了马列主义新思想的中学生们，知道了旧势力的企图后，群情激昂，怒不可遏。李运昌带头向县劝学所的杨所长开炮。这位杨所长是个旧劣绅式的人物，好抽大烟，卡学校的经费就是他干的。李运昌带着同学们暗中盯住了他，当他正在城里一家烟馆美美地抽大烟时，学生们一拥而入，七手八脚夺了他的烟枪，宣称如果不给中学拨经费，便向上边告发他。他惧怕学生把事情闹大答应了学生的要求，给乐亭中学拨了经费，使学校继续办了下去。抓大烟案轰动乐亭县城，成了街谈巷议的一件新闻。通过这场斗争，李运昌和他的同学们看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想的威力。不久，省教育机关也知道了这件事，把乐亭县劝学所那位杨所长给撤了，由前清的一位老秀才白凤鸣任所长，他没敢找乐亭中学的毛病。

不久，王校长又聘请北京工业大学毕业的王佩环任英语教员。王佩环也是1923年入党的老党员。这样，乐亭中学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向学生介绍《向导周报》、《先驱者》等进步报刊和《马克思主义浅说》、《唯物史观》、《社会主义讨论集》、《西方革命史》等书籍，培养青年学生的政治觉悟，直接从青年学生中发展党员、团员。

李运昌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书籍，他对新文化运动入了迷。1924年学校放暑假，他没有回家，在学校阅览室里学习进步书刊。他还积极宣传这些新思想，在王老师的指导下，他与北京、上

海的共产党组织办的报刊建立了联系，并承担着这些报纸和刊物的宣传和推销工作，经常利用假日到县内外各学校去宣传、推销进步报刊。这年7月，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秋天，李大钊从苏联回国后，要动员一批青年学生到苏联去学习，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乐亭中学党支部经研究决定派李运昌赴苏联学习。他从王校长手里接过介绍信，高兴得蹦了起来。他向往苏联，能到社会主义的苏联去学习，他觉得自己太幸运了。辞别学校后，他回家筹集路费，连夜赶赴北京去找李大钊。

李运昌于1924年正月十八与农村姑娘云丽珍结婚，结了婚便上学，这次又赴苏联学习，夫妻自然难舍难分。他为了革命大业，已把自家利益与儿女情长置之度外。他嘱咐妻子在家中替他照顾好年迈的父母，并告诉妻子不要把他去苏联学习的事告诉父母，怕老人家担心。他借口到天津参加学联会向家中要盘缠。

李运昌取道北京，根据王校长信上写的地址，找到了当时任共产党北方区书记和国民党执行部负责人的李大钊。李大钊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认真打听家乡的革命形势和人民的生活状况，又问他为什么愿意去苏联学习？李运昌向李大钊介绍了家乡的情况和乐亭中学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新思想的形势，又告诉李大钊，因为苏联革命成功，实现了社会主义，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所以愿意去苏联学习，回国后更好地搞好中国的革命。李大钊赞同地点点头，亲切地告诉李运昌：“你来晚了几天，到苏联的船已经从天津开走了，去不成了。现在，黄埔军校正在招生，你到黄埔军校去吧！中国革命需要军事人才。”就这样，李运昌没有去苏联，而进了黄埔军校。这一年他刚刚17岁，戎马生涯从这里开始了。

李运昌从天津乘船，辗转到达广州，到南方区（广州市文明路）换介绍信，陈延年（陈独秀之子）当时是共产党南方区的负责人，陈亲自找李运昌谈话，并说黄埔军校没有团组织，团员就是党员，把他由团员转成中共正式党员。

1925年11月10日李运昌进入广州黄埔军校，同新来的学员编到五连当兵，每天练操、学习、执勤。他的执勤地点在新收复的一艘军舰上；这艘军舰是旧军阀投降时留给广东政府的，因为旧军队不可靠，就派学员兵轮流去站岗执勤。广州的革命形势比冀东好，到处有革命的标语口号，妇女公开参加社会活动，比北方开放。这些青年学生感到十分新鲜。但生活艰苦、水土不服，许多北方来的学员适应不了，个别学员吃不了这份苦，开小差跑了。李运昌生了脚气病，脚面肿起老高，用手一搓就滴脓水。由于他思想坚定，每天带病坚持执勤和操练，终于坚持下来了。

1926年2月，黄埔军校对入伍生进行考试，考试合格的开始正式学习。李运昌顺利通过，开始进入正式学习阶段。这时黄埔军校改称为中央政治军事学校，校长是蒋介石，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教课的人除了苏联教官外，国内有肖楚女、恽代英、顾孟羽、陈启修等名人。

1926年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年7月6日，广州东校场举行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大会，望着群情激昂的革命场面，李运昌的心都飞了，他浑身热血沸腾，恨不得马上投入到北伐的洪流中去，可是当时他们还没有毕业，还正在学校学政治课。

1926年10月，李运昌从黄埔军校毕业，被中共广东省委派往汕头组织农民武装。在前往汕头之前，他参加了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了两个月。从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后，他收拾行装，前往汕头任广东省农民协会惠潮梅办事处农军部主任。办事处主任由彭湃担任。

李运昌用黄埔军校的训练方法，训练民军骨干。他规定每县抽出120人到300人为民军基干队，队员都是年轻力壮、革命信念比较坚定的青年农民，配足枪支，由他从广州带去的十几个人当队

长。

李运昌自1926年11月着手组建农军，在潮阳县和普宁县各设立一个农军大队，其他县设中队，一个大队有二三个中队，农军骨干队员共计两千多人。农军军旗是红色底儿，中间绣一黄色梨杖，旗长1丈，宽4尺5寸，往城头一插，非常气派。

当时各县县长多是国民党党员，但他们手里没有武装，县长上任，得先拜会农民协会和农军队长。共产党和农民运动的发展壮大，国民党右派势力十分不安。于是在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4月中旬，随着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东也发生了反革命政变。首先在广东省府所在地广州市开始清党，汕头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开始抓共产党和农会负责人，农军是公开活动的，农军负责人是他们要抓的重点。

当时彭湃到汉口参加中国农民协会去了，李运昌在普宁县检查农军工作，汕头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汕头的农军骨干也大都跑到普宁。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峻形势，李运昌决定组织各方来的农军骨干共同举行暴动。4月23日，举行暴动的当天便集中了农民自卫军10000多人，暴动后第一仗就消灭了汕头国民党何进武部的一个团，起义的农民武装士气大振。随后李运昌派人与陆丰的新田、井田区的农军联系，又有2000多受过训练、手中有枪的农军骨干前来会合。

作为这支农民武装领导人的李运昌，将这支队伍引向何方？下一步该怎么办？当时他的确没有完整的方案，因为当时共产党还没有领导军队的经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还是半年之后的事，南昌起义也是一百多天以后的事。李运昌把这支队伍带到梅县，想找到共产党的组织，听从党组织的意见，结果梅县的党组织也都撤走了。李运昌又把这支队伍拉到五华，在五华他找到了古大存，他建议李运昌率领这支队伍在惠潮梅一带打游击。李运昌在黄埔学习

的是攻防战，没学过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又赶上国民党胡谦率一个整编师的兵力来追截农民军。李运昌召集各队负责人开会研究，决定将这支队伍改名为“惠潮梅农工救党军”。会后，他率这支队伍转战江南、湖南，一路上杀土豪劣绅，打开监狱释放政治犯，在那个鱼龙混杂的形势下，有枪杆子就有政权。

在湖南汝城，李运昌派人到汉口去找党，以进一步取得党的指示，一连派去两批同志，都没有消息回来。最后部队决定奔永兴，由永兴沿湘江去汉口。部队号了几十只大船，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船队，到衡阳后，他派往汉口联系党组织的方凌川从汉口赶回来了，他带回中央军委周恩来的指示：国共要分家，你们这支队伍不要到汉口来，立即返回湘南，就地暴动，建立工农武装。

周恩来在方凌川的陪同下，来到了农民军中间。李运昌在黄埔时就多次聆听过周恩来的指示，在海陆丰时，李运昌与周恩来在一起工作过，周恩来的威信很高。听了他的指示，李运昌等当夜便将队伍拉回湘南，把各县的农民起义军集中起来，将部队改编为湘南革命军第二师，湖南省委派来一个师长叫陈东日。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为第一师。

部队整编后人员还没集中，广州范石生的部队便包围了二师师部。在事先没有侦察、仓促应战的情况下，尽管没有经过多少训练的农民军很勇敢，毙伤了许多敌人，但农民军牺牲很大。师长陈东日决定让大家分头突围，突围后在壕头集合。李运昌率部分广东农军突破重围来到壕头时，见陈东日正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嚎啕大哭。李运昌见状，心里觉得不是滋味，严肃地对他说：“师长，陈东日同志，你是部队的主帅，这个时候怎么能只顾自己哭？你得赶快想主意，下一步该怎么办？”

原来陈东日的警卫员叛变了，把他的枪和钱包都带跑了，他已是一个分文没有的光杆司令。

李运昌建议把突围出来的部队编成一个团，为湖南革命军第

二师第一团。队伍编好后，拉回湘赣边界一带打游击。经过一段游击战斗，农民军恢复了元气，又补充了一些人员和枪支，突然杀了一个回马枪，夜袭汝城，大获全胜。不久，接到中共湖南省委的通知，命令这支武装与一师共同举行秋收起义。

三

1927年11月，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国共两党关系破裂，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此时，李运昌途经江西回到故乡乐亭县木瓜口村。

大革命失败了，李大钊牺牲了，乐亭的政治空气异常沉闷，许多共产党员在白色恐怖中动摇、消极、失望。李运昌回到故乡，又给家乡的革命斗争播下了火种。他首先看望了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和女儿李星华，她们已从北京迁回家乡。他又找到县委书记贾坤普和另外5名县委成员，但这些人对李运昌说他们已宣布退党，说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

李运昌在危难之中担任了乐亭县委书记，又冒着生命危险联系了徐凌汉、田砚农、刘贺生、宋匡我、黎巨峰、田厚轩组成中共乐亭县委员会，并建立起农会、工会组织。

1928年秋，在李运昌组织和领导下，发动了乐亭县城工人大罢工。首先是鞋业工人召开提灯会。10月10日晚，100多名鞋业工人提着灯笼，举着小旗，上面写着“要求长活价”的标语，吸引了城乡数万人围观，木业工人也来参加罢工，广大群众都支持工人的罢工。国民党一看乐亭的事态闹大了，便调集军队前来镇压。李运昌立即召开县委紧急会议，指出敌强我弱，不能硬拼，县委决定转入地下，工会、农会的骨干也都暂作躲避，保存实力。

李运昌从家中取了些盘缠，连夜跑到了滦县，住在滦县师范教师薛智勇家中。薛智勇当过李运昌的小学老师，有进步思想。李运昌向他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介绍他加入共产党，并在滦县师范建

立了一个党支部，并把从乐亭过来的县委成员和滦县的党组织合并，成立了滦乐中心县委，继续坚持地下斗争。李运昌任书记，李仁林任组织部长，宋旷文任宣传部长。

1928年12月，李运昌代表京东地下党组织到天津租界参加顺直（顺，即顺天府，北京的旧称；直，即直隶，相当于现在的河北省，顺直泛指北京市、河北省）省委的扩大会议，周恩来从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回来，受中央派遣，来参加顺直省委扩大会，解决省委与保属、直南、京东等区组织之间的矛盾。会后不久，李运昌被调到顺直省委工作。

周恩来针对顺直省委存在的问题，对原省委进行了改组和调整，省委书记王振德，是开滦煤矿工人出身。组织部长张景润，宣传部长陈潭秋，都没到职。农委书记郝清义，军委书记张兆丰。李运昌任省委秘书，同时任秘书的还有宣传部秘书胡锡奎，军委秘书薄一波。

省委机关设在租界里，是秘密机关。由于党内出了两个叛徒，其中之一就是原省委书记王兆文，使省委机关遭到重大的破坏，省委和天津市委的许多领导都被捕了。李运昌因外出执行任务得以幸免。

顺直省委第一次遭到严重破坏后，中央又派张景润来接任省委书记，李运昌代理一段秘书长，后又到组织部当秘书，为了掩护他的身份，组织上把他妻子云丽珍从乐亭接到天津，租房子住在了机关。

省委机关平静了一段时间。1929年下半年，党内左倾思潮抬头，省委机关动员机关的党员去搞“飞行集会”。李运昌是省委组织部的秘书，掌握着省委机密，本来是不应该搞“飞行集会”之类的活动的。但省委书记张景润受左倾路线影响，只强调革命不怕死，要求都上街撒传单。这等于把省委秘密机关全暴露给敌人了。李运昌和区委书记赵毅在劝业场撒传单时，被密探盯住，当场被捕。被

捕后，李运昌便琢磨怎么对付敌人，保护党的机密和机关的安全。当时他仅有 21 岁，身体很瘦，穿一身蓝色学生服，他假称自己是来天津考学的。敌人对他实行严刑拷打，他一口咬定叫李初学，是从昌黎来天津考学的。敌人没有从他身上查出什么破绽，但就凭他撒了“打倒国民党”、“苏维埃是中国的唯一出路”等反政府的传单，就判了他违反国民紧急治罪法第 6 条监禁一年零一个月。

开始他被监禁在普通监狱，他在狱中鼓动犯人绝食，要求改善生活，后被转入天津“模范监狱”。“模范监狱”里关着 80 多人，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员。监狱里有我们党的内线，每个人的表现和身体状况可以传递出去。李运昌来到“模范监狱”不久，组织上便安排他妻子云丽珍来探监，给他带些零用钱和衣服。李运昌见妻子孤苦伶仃的，怕给组织上添麻烦便动员她回老家去。云丽珍不仅同情和支持丈夫参加革命，而且十分通情达理，她想自己住在天津组织每月要花二十多元房租，便点头答应回老家去。三天后，组织派田砚农把云丽珍送回乐亭老家。

转眼到了 1929 年的冬天，这一年的冬天特别冷。监狱里没有取暖设备，李运昌还穿着夏天的衣服，根本没法过冬。一个老狱卒见他是个瘦弱的学生，很同情他。李运昌给家中写了封信，让这个老狱卒给带出去。

云丽珍回家后，没有把李运昌坐牢的事告诉婆母，怕她承受不住。这次接到李运昌来信她才把实情告诉了母亲，母亲咬了咬牙，对儿媳说：“卖地！”地是庄稼人的命根子，老母亲为了儿子，为了革命，卖了 10 亩地换回 200 块大洋，吩咐媳妇买布做棉衣棉被赶快给儿子送去。

云丽珍第二次到天津时，天正下着鹅毛大雪，马路上的大雪足有一尺多厚。云丽珍背着给丈夫缝制的棉衣、棉鞋和棉被，提着从老家带来的许多食物。此时她已怀孕八个多月了，腆着大肚子，穿一身兰布长袍，又是缠过脚的人，在雪里一步一滑找到监狱，给狱

卒一块大洋，才见到了李运昌。他见爱人送来了钱和衣服，真正感到是雪里送炭，他把妻子带来的食物分给难友们。穿上了妻子亲手做的棉衣棉鞋，暖流涌遍全身。他的眼睛湿热，强忍住泪水。

李运昌用家中送来的卖地钱，托老狱卒从外边买来许多书，有《唯物史观》、《西方革命史》等。当时狱内不准看中国的《水浒》，但对外国的书籍却不禁止，因此他们读了许多革命书籍。狱里秘密组织了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彭真，他的化名叫傅茂公。

1930年9月17日，李运昌刑满出狱。组织上考虑到他的处境，派他到沈阳任全国铁路总工会满洲办事处主任。10月李运昌到达沈阳，那时候东北土匪多，没有家属的人很难租到房子，他便把云丽珍接到沈阳，一直工作到“九·一八”事变。

1933年底，李运昌从沈阳回到冀东，在迁西搞了一次农民暴动，结果失败了。他组织“京东御侮救亡会”，宣传抗日救国，发展救亡会组织，从乐亭发展到昌黎、滦县，然后扩大到丰润、京东一带。

1934年5月，李运昌回家取经费，在家中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敌人便包围了李家的院子，云丽珍正在院子里干活，见一伙持洋刀的士兵包围了院子，马上报警让李运昌准备。他从窗户玻璃往外一看，敌人已封锁了院子，不好突围了，便拔出手枪，顶上子弹，躲进堂屋6个米缸中间的一个空缸里，上面让妻子盖上了木盖，一旦敌人揭开这缸盖，他便开枪。敌人进屋便问李运昌的母亲：“你儿子在哪儿？县长请他商量点事儿。”老太太不慌不忙地说：“我儿子才吃完早饭，到小学校商量事去了，你们先在我家里等着，我去给你们找去。”敌人信以为真，马上跑步包围了村里的小学校，那里的确是李运昌和岳泽甫等地下党活动的据点。

敌人在学校里没抓到李运昌，又转回他家搜查，这时李运昌已从后院钻进了庄稼地里，无法抓到了。敌人把他家的柴禾垛、牲口棚里里外外翻个遍，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

时过不久，李运昌回家又被敌人摸到了风声。这天早晨云丽珍